

評介洪九來著《寬容與理性—— 《東方雜誌》的公共輿論研究 (1904-1932)》^{*}

丘文豪^{**}

洪九來,《寬容與理性——《東方雜誌》的公共輿論研究(1904-1932)》。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一版。367+21頁。

一

《東方雜誌》自1904年誕生以來,其重要性早為時人所認識。1960年代起,有別於前人介紹與評述性的文字,對《東方雜誌》進行整理與研究的腳步也逐漸展開。¹自1980年代開始,有鑒於中國大陸長期革命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加上臺灣在政經發展成就的模範,以往肯定轉化,給予革命較高評價,貶抑調適取向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典範也開始轉變。²1980年代至今,知識分子研究成為中國大陸

^{*} 本文承蒙一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2年10月2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年12月5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¹ 趙曼,〈《東方雜誌》研究總述〉,《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4卷第20期(2009年10月),頁109-112。另外,本書也論及《東方雜誌》的研究狀況,詳參洪九來,《寬容與理性——《東方雜誌》的公共輿論研究(1904-193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頁2。

²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學術界的重要主題，1990年代中期以後，更將注意力放在知識分子的社會文化史與都市史的視角下。本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產生。

《東方雜誌》不論是作為史料或是研究對象，都是相當珍貴的寶庫。在本書出現以前，大都是從出版文化史的角度，³ 以單一主題的方式對《東方雜誌》進行研究。⁴ 本書最特別之處，在於作者從整體、長時段的視角作出綜合性的評述，避免了割裂與肢解研究主體的現象，並以哈伯馬斯（J.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理論（public sphere）以及雅賽（A. Jasay）「鬆散的自由主義者」定義，作為研究的預設。正如作者所言，從《東方雜誌》的研究概況可以發現，「其研究的進程從初始的簡單介紹與評述，到後來的整理與挖掘。……其研究的領域也從最初限於報刊出版一隅漸漸走向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頁5）

二

本書為作者洪九來將1999年發表的博士論文，⁵ 經過近十年的修改後成書，並收入許紀霖主編「都市與知識群體研究書系」。除〈導論〉與〈結語〉外，本書共分8章。在〈導論——《東方雜誌》的「守門人」：類型與意義〉，作者回

究所，2006年），頁11-14。此後，有關調適思想的研究如高力克，《調適的智慧——杜亞泉思想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甚至以往視為更保守的「中體西用」的價值，也為研究者所提出，如吳永，〈「中體西用」思想及其當代價值再審視〉，《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29卷第3期（2009年5月），可見這一典範轉換的影響。

³ 趙曼，〈《東方雜誌》研究總述〉，《樂山師範學院學報》，頁110。

⁴ 如李盈慧，〈抗戰前三種刊物對中日問題言論之分析——《東方雜誌》、《國聞週報》、《獨立評論》之比較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許惠文，〈報刊輿論與清末預備立憲（1905-1911）——以《申報》、《東方雜誌》為中心之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張碧月，〈《東方雜誌》之救亡思想言論的演變（1904-1937年）〉（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朱娟慧，〈《東方雜誌》對歐戰時期西方婦女解放思潮的引介（1914-1925）〉（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以及本書作者若干期刊論文。

⁵ 博士論文題目為〈現代公共輿論的催生與培育——《東方雜誌》研究（1904-1932.2）〉（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1999年），指導教授為姜義華。洪氏目前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系。

顧了《東方雜誌》的研究史，將其中的知識群體定義為「鬆散的自由主義者」，並強調其在20世紀上半葉開拓「公共領域」的功勞。作者在前兩章中，以較宏觀的角度檢視《東方雜誌》的特色。第一章〈時代變遷與話語轉換〉，作者首先鳥瞰1904-1932年間的發展，並將其分為張元濟、夏曾佑與孟森、杜亞泉與錢智修、胡愈之與俞頌華4個時代。第二章〈苦心經營的「公共領域」〉則以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說明《東方雜誌》在內容上廣泛多元；撰稿人群體包含各方派系；以穩健、持中為方針的態度；啟迪國民的自我期許；以及在商言商的經營策略。

接著，作者以主題的方式分章，並在各章中以時間為脈絡，較微觀的檢視《東方雜誌》的特色。第三章〈政治秩序轉換中的理性主義〉說明《東方雜誌》自創刊以來的立憲主張，發展為對集權與分權的折衷態度，以及賢人政治概念的提出。第四章〈社會變革進程中的漸進主義〉，說明《東方雜誌》對進化論的反省及與階級鬥爭保持距離，並主張由下而上的社會改革，以及類似胡適所謂「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的立場。第五章〈納入世界格局的民族主義〉從《東方雜誌》對「黃禍論」的代表性觀點出發，說明其民族主義的態度與激烈的革命派不同，而是持調和、保守的主張，迄1920年代因民族危機的加深，有改向「民眾運動」的傾向。第六章〈中西文化衝突中的調和主義〉，以1918年陳獨秀與杜亞泉的中西文化論戰，以及1926年胡愈之與張東蓀就理智與情欲的問題展開的一次小論戰，說明《東方雜誌》所持論點的特色與延續性。第七章〈新舊文學擅變中的現實主義〉說明《東方雜誌》以復古及託古的手段，將先秦與明清之際諸大家的思想精華，作為其進步主張的思想資源。第八章〈古今學術流變中的進步主義〉，說明《東方雜誌》強調自身在撰稿上不作政治宣傳，不為商業利益所惑，專以學術與時論為主的原則。

結論〈《東方雜誌》知識分子群體在轉型社會中的地位及其困境〉，作者再次強調，雖然因其一以貫之的理性主義與寬容態度，使《東方雜誌》群體在當時顯得相對落後與保守；但《東方雜誌》群體以調和的態度，對營造有益的政治氛圍，促使社會改良的苦心應該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不能體認到中國因小農經濟與宗法制度為基礎的政治、文化頑固勢力，非打破不可，否則任何的嫁接與調和努力皆無濟於事，正是《東方雜誌》群體的困境。

三

正如本書書名，作者說明了「寬容」與「理性」這兩個《東方雜誌》群體所展現出來的特徵。至於結構上，宏觀與微觀並重。先是簡述時間脈絡上的演變，並說明其一貫的特色後，再針對各單元逐一說明。在解釋上，避免了文本分析常脫離其時代脈絡的毛病。作者在說明《東方雜誌》若干思想時，也注意到其與環境、思想界的關係。如以《東方雜誌》的立憲主張與梁啟超作比較，說明《東方雜誌》雖然站在梁啟超一方，但在一些具體的差異上與梁氏互有依違，可見其獨特之處（頁98-106）。⁶ 接著，說明1920年代《東方雜誌》對西方代議制的懷疑與批評，並非其編輯所獨有，而是整個中國思想界的趨向（頁132），也可見其立論的周到之處，並不過度放大研究對象的意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處理1918年中西文化論戰時，特別指出記者黃遠生才是始作俑者。黃氏不客觀、不冷靜，反倒是宣洩個人情感的文化比較工作，拉開了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文化大論戰的序幕（頁258-261），這樣的解釋，在其他的研究中誠屬少見。⁷ 至於作者在史料上所下的功夫，更是無庸置疑的。

本書最特別之處，當是作者使用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及雅賽「鬆散的自由主義者」的定義，作為研究的起點。

所謂的「公共領域」，含有相對於政權，監督政府、領導輿論的功能，⁸ 在中國新聞業特別是從所謂的第二階段開始（1890年代），其民主化、啟蒙民眾的政治功能特別突出；⁹ 而所謂鬆散的自由主義者，則是以寬容與多元作為特色（頁9）。然而，作者為了強調《東方雜誌》開拓公共領域的貢獻及擁有鬆散自

⁶ 如張朋園則單純視《東方雜誌》為立憲派的言論機關，詳參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長春：吉林出版有限集團，2007年），頁42-43、49-50。

⁷ 如高力克，《調適的智慧——杜亞泉思想研究》一書就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⁸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Frederick Lawrence (Mass.: MIT Press, 1989), pp. 27-31, 182.

⁹ 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The Eastern Tim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Late Qing China, 1904-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h.D, 1993), pp. 12-17.

由主義者的特質所作的許多解釋，仍有待商榷之處。

首先，作者認為對比於其他期刊的短命（頁71），在當時顯得相對落後與保守的《東方雜誌》（頁352），之所以能夠在經歷了數次暫時停刊後，不斷的重新出發，成為最長壽的一份雜誌，是因為張元濟「在商言商」，不依重黨派，並與政治活動保持距離（頁26-28），保持穩建持中的基調（頁79），迴避語出驚人的話題（頁126），且擅長捕捉社會焦點，迅速組織稿源（頁89），走商業化的道路（頁90）。這便是《東方雜誌》長命與超然於政治利益，保持相當獨立地位，進而「理性與寬容」的原因。

然而，筆者認為就算《東方雜誌》獨立於政治利益之外，也不表示其精神便不受制於其他因素。「在商言商」這一詞彙，在與輿論出版扯上關係後，可能不如作者強調的超然，甚至有些負面意味。

顧慮到雜誌的經營，則必須迎合大眾的胃口。若由此出發，《東方雜誌》擅長捕捉焦點，如介紹當時轟動一時的嚴復譯作（頁91），以及支持立憲的主張，¹⁰可能就是為增加銷售量所為。另外，諸多增刊與特刊，如1925年的《五卅事件臨時增刊》，可能也是為迎合社會輿論所作。另外，雖然「在商言商」的方針，擺脫了政黨的控制，但也相對增加了資金一端的牽絆。如商務印書館與日本著名的出版機構金港堂合資組成有限公司，一些日本人士相繼進入商務編譯所（頁30）。這樣的情形，可能不只是促成張元濟聯日主張的情感因素，甚至《東方雜誌》編輯在日俄戰爭中，將日本視為友邦的誤判，可能是不得不為的限制（頁208）。

若繼續以迎合大眾的角度思考，《東方雜誌》數次改變經營策略，可能也是在觀望風向。如Ted Hunters認為，在中西文化論戰敗陣後，張元濟以無法針對新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調和出版社方針，並兼顧穩定的銷售量為由，撤換主編杜亞泉。改採白話文，更完全是市場導向的考量。¹¹ 關於連載刊登白話小說的部分，

¹⁰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8。

¹¹ Ted Hunters, "Culture, Capital, and the Temptations of the Imagined Market: The Case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Kai-Wing Chow, eds.,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pp. 28, 31-34.

也有學者指出，當時報刊的銷路都與小說大有關係；為求利潤，絕大多數的報章雜誌也刊登新小說，以吸引讀者目光，增加發行人。¹² 可能就是因為「市場取向」，使《東方雜誌》遭受時人「毫無主張」的批評。¹³

作者在強調其一以貫之的特徵時，以公共領域的角度切入，或許將《東方雜誌》的位置放的太超然、太神聖，忽略了市場取向的限制。雖然這時的《東方雜誌》獨立於政權之外，但與1904年的《時報》一樣，發揮主動領導輿論、限制政府權力、對政府施加壓力的功能，¹⁴ 不如說它反而被市場大眾所牽引。而所謂寬容不同立場的「鬆散自由主義者特色」，可能也只是為了迅速調整立場，以維持雜誌的經營。

此外，作者為了強調《東方雜誌》在1904-1932年之間，是以公共領域的功能及鬆散自由主義者的特質作為一以貫之的特色。就忽略了在如此長時段間，《東方雜誌》與社會環境的互動，將其與所處的社會脈絡脫節。

作者雖然注意到胡愈之與俞頌華等人對舊式自由主義採取批判的態度（頁15），在1924-1932年間在這些新生代主筆的帶領之下，《東方雜誌》脫離了不合時宜的保守主義，走向更加開放的自由主義時期（頁55）。可見在新文化哺育之下成長的一輩，與之前的主編開始有許多特徵上的差異（頁54-67）。

然而，作者認為《東方雜誌》一直存在著重視「問題意識」的特徵（頁177），筆者在這兩人身上卻無法看見。胡愈之在1923年倡導一種民眾運動，強烈呼籲各階級的民眾形成有組織、有實力、目標明確、步調一致的政治運動（頁243），反而展現出與前段截然不同的特色。

筆者認為，以胡愈之為斷點，與前代主編調和、緩進、平穩的特色，當有所區別，這或許是和時空環境有所關聯：1924-1926年間，是中國南北武力權勢更

¹² 張仲民，〈清際啟蒙人士改造民眾閱讀習慣的論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2011年6月），頁66。

¹³ 如陳獨秀、羅家倫的攻擊。詳參張碧月，〈《東方雜誌》之救亡思想言論的演變（1904-1937年）〉，頁31。

¹⁴ 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The Eastern Tim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Late Qing China, 1904-1911*, p. 69.

迭快速的時期，¹⁵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更是使反帝國與反軍閥的思想大盛，¹⁶ 在這樣動盪的情況下，行動壓倒了言論，¹⁷ 政治議題的急迫性更甚於前，逼著人們不得不作出反應。¹⁸ 可惜的是，作者凸顯《東方雜誌》「鬆散的自由主義者」的整體性時（頁25），忽略了《東方雜誌》與時空環境互動後產生的內在階段性差異。

最後，作者認為《東方雜誌》的另一個特徵是「由下到上的社會改革主張」（頁349）。然而，第三章〈政治秩序轉換中的理性主義〉第三節〈賢人政治：對民主模式的另一種設計〉，提到這種由上到下的政治設計，分明與「由下到上的社會改革主張」產生矛盾。作者雖然說明杜亞泉任主編時對賢人政治的態度比較含蓄與委婉，要到陶惺存、錢智修繼任後才鮮明的支持這一政治主張（頁135）；隨後又提出一篇《東方雜誌》批判賢人政治缺點的史料（頁139）。然而卻無法解釋「由下到上」的特徵與提出「賢人政治」的矛盾。

四

西方學者認為由於中國在引介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時，沒有強調「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或「公共領域」觀念，導致中國無法真正的建立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¹⁹ 而蘭欽（M. Ranking）與羅威廉（W. Rowe）等學者則提出中國其實存在一種不具批判性的管理型公共領域的看法，²⁰ 本書所屬的「都市與知識群體

¹⁵ 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03。

¹⁶ 以小說創作而言，左派小說家在五卅後更為活躍，可見五卅慘案對於當時人的震撼與影響。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增訂版）》（臺北：東華書局，2008年），頁253。

¹⁷ 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頁7。

¹⁸ 如1924年1月後不談時政的楊蔭杭，卻在1925年9月後在《時報》略談政治；而胡適自1926年11月起，也開始在英、美兩國談政治。詳參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77、235。

¹⁹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頁14-17。

²⁰ 詳參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The Eastern Tim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Late Qing China, 1904-1911*, p.v.; 洪九來，〈許紀霖總序〉，《寬容與理

研究書系」正是要回應這樣的一個批評。他們確信「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有過一個類似歐洲那樣的生產公共輿論的公共領域。」²¹ 而本書以公共領域的性質對《東方雜誌》進行研究，正是回答了這樣的一個質問。然而，使用西方歷史經驗下所產生的「公共領域」概念作為對照，雖然能夠凸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特點與不足；但或許正是為了強調中國甚至是《東方雜誌》「有」西方人認為我們「沒有」的特質，而忽略了中西思想上的根本差異。²² 如缺乏幽暗意識的中國，是否能夠產生由下而上「監督、制衡」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就令人相當懷疑。²³ 筆者在前文提出的若干討論，便都在本書作者過度強調「公共領域」功能、「鬆散自由主義者」特色，以及《東方雜誌》有著一以貫之的精神時，導致研究上的預設立場與解釋上的誤判。此外，在思想分析上，作者也忽略了《東方雜誌》的思想模式、預設與傳統的承繼關係，以及對於時代環境的回應，也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²⁴

本書在配合理論所展開的論述之下，可能忽略了研究主體所處的歷史背景。但在宏觀的學術史角度，本書在《東方雜誌》研究往思想史方面前進確有相當的貢獻。作為文化史，尤其是所謂「新文化史」的材料與研究對象而言，《東方雜誌》更值得許多研究心力的投入。1990年代以來，西方漢學界除了一向關注的城

性——《東方雜誌》的公共輿論研究（1904-1932）》，頁6。

²¹ 洪九來，〈許紀霖總序〉，《寬容與理性——《東方雜誌》的公共輿論研究（1904-1932）》，頁9。

²² 如楊芳燕指出，使用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作為分析範疇時，背後仍蘊含著將西方歷史經驗做為普世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楊芳燕，〈明清之際思想轉向的近代意涵——研究現狀與方法的省察〉，《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01年），頁45。

²³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頁3-32。雖然梁啟超已有某種程度上的幽暗意識，但畢竟屬於少數，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相當程度上便是由於幽暗意識的缺乏，詳參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此外，自宋代以來，由於科舉的關係，士人多抱持「報君恩」的想法；清末，激烈如譚嗣同，仍出現「聖恩高厚，蓋可見矣」及「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的言論，這一傳統士大夫的態度，對於西方意義下的公共領域的出現，可能也是一大限制。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531、546。

²⁴ 如前文提到，本書雖然注意到《東方雜誌》思想與環境、思想界的關係，但在其與傳統預設、思考模式及思想源流中的特色，卻沒有提及。

市史研究外，書籍史、報刊史、出版史、印刷史，以及閱讀史也相當流行，²⁵ 或可從「閱讀行為」、「讀者與讀物間的關係」等，強調讀者能動性的角度對《東方雜誌》進行檢視。²⁶ 然而這都需要在本書將《東方雜誌》作為一整體的思想史研究基礎上展開，本書首先以整體綜合的角度出發，確實是在《東方雜誌》研究上，往前邁進了一步。

²⁵ 張仲民、樂敏編，〈編者的話〉，《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

²⁶ 有關閱讀史的研究近況與視角，可參見李仁淵，〈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收入張仲民、樂敏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213-254。

國史館館刊 第 36 期